

從胡适之的書法看他的思想

閔品方

2014年12月12日

胡適（1891-1962年），字適之，安徽省績溪縣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他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胡適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胡適畢生追求自由、民主和科學，終身不渝。他早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於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23歲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受學於哲學家約翰·杜威。26歲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是當年北大最年輕的教授之一。此後歷任北大教務長、文學院院長、校長、天主教輔仁大學教授、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中央研究院院士、院長、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中國公學校長等職。

胡適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胡適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有深刻的思考。他1930年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剷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他於1932年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時，邀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和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先後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1935年，胡適獲頒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38至1946年，旅居美國，從事學術研究，先後出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和哈佛大學講座教授，1945年，先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後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1946至1949年，胡適回國，任

北大校长。1949年再赴美国，晚年常到臺灣。1962年，在台北出席酒會時心脏病猝发病逝。

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用主義哲學（杜威的 **pragmatism** 是實用主義，胡適自譯為實驗主義）。胡適很喜歡「談墨」，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1921年，梁啟超將其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胡梁二人惺惺相惜。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响。胡適隨後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论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鄭振铎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

1920年，胡適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他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周策縱評胡適新詩清新，卻乏朦朧的趣味。

胡適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劇情裡，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離家出走。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 - “问题小说”。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來研究中國學術。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七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

《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紅學派所謂考據派的創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孤本的發現者和擁有者，並且接下來發現了一系列珍貴的版本，比如《庚辰本》，為現代紅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胡適認為《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殘遊記》。他之所以考證紅樓夢，只是為了打破“索隱派”舊紅學的穿鑿附會，要證明《紅樓夢》不過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終目的是「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的「思想學問的方法」。1926年，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倫敦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裡的禪宗史料。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

1942年，胡適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胡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此後十幾年間，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考證文字。《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哲學。戴震是胡適的徽州老鄉。胡適花了那麼多功夫研究來為戴震辯冤白謗，因為他一向有袒護安徽同鄉的習慣，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要發揚戴震的“從一事一物”開始“訓練心知之明”，以“漸漸進於聖智”的做學問的漸進法門。

胡適一生對孔子言行與思想的評價有褒有貶，其關於孔子的論文最重要的有「中國古代哲學史」、「說儒」等，但胡適去世前不久，在「自由中國雜誌」所寫的「容忍與自由」裡的一段文字，應屬其對孔子的極重要的最終評價之一。他舉出“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孔子「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的論述，認為“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創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明“奇技異器”的科學家，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1958年，胡適從美國回到臺灣定居。同年，內地發起大規模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胡適響應說：“我覺得世界上近二、三百年來有一種公開的趨向，朝科學民主這個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學方法走。那時候我朋友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我表示過这样的话，把這個抽象名詞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犯錯誤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會盲目崇拜。當時我朋友陳獨秀只認得兩個名詞，不知道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

1962年，胡適於會議中突發心臟病去世。胡適的墓誌銘，由知名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書寫，其內容為：“這是胡適先生的墓。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胡適是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他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和新詩的學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胡適有一套“治學方法”。胡適獨具慧眼，提拔、任命和幫助梁實秋完成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毛澤東建立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黨校“湖南自修大學”，是因為胡適的提議和倡導。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自稱：“你的學生毛澤東”。毛澤東在五四時期，受到胡適及杜威實用主義的影響，理論聯繫實際的毛澤東，思想觀點與之頗有共通之處。胡適在《每周评论》曾專文稱贊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评论》最初幾期的內容。胡適畢生提倡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影響頗為深遠。他提倡的自由主義，意指健全的个人主義精神和基本的人權主義精神。胡適既掀起了新文化運動，又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他還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禮，可說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在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中，胡適被稱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而胡適的自我定位是：“有時我自稱為歷史家；有時又自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麼專家。”胡適沒有梁啟超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適的著作裏是找不到的。比較起來，梁啟超更具有自我反省的自覺能力。

余英時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稱：“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也說：“他沒有深入西學固是事實，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他在《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又稱：“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

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我們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留學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

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一書中，給胡適相當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溫源寧在《不夠知己》一書中，這樣評價胡適：因為胡博士已在國立北京大學講授哲學多年，人們稱他為哲學家。當然，他是個哲學家。但是“哲學家”這個稱呼，卻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動。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名稱能夠用來稱呼胡博士這樣一種人，我想 18 世紀那樣一種用法的 *philosophe* [*philosophe* 和 *philosopher* (哲學家) 不同，前者是指 18 世紀以狄德羅、盧梭和伏爾泰為代表的那些啟蒙思想家和哲學家] ——“哲人”，就恰好合適。在“哲人”身上，俗人、學者、實干家和哲學家的成分全都有。他們對宇宙的结构模式全都有個精確的看法，寫東西全都有一種實干家的樂觀和自信，全都用明快而有權威的文筆談論太陽底下各種各樣的問題。無論是對是錯，他們全都有勇氣發表和堅持自己的主張。放在這樣一群“哲人”中間，胡博士也不是最不出色的。而在中国，我不敢說他就不是惟一的一個當代哲人。

季羨林曾評價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胡適說：「一個常態國家，政治的責任在成年人，年輕人的興趣都在體育，娛樂，結交異性朋友；而在變態的國家，政治太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那麼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

1938 年，胡適出任駐美大使。消息傳到日本後，日本內閣倍感壓力。當時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發起建議，應該派三個人同時出任駐美大使，才可以抑制住胡適的能力。三個人分別是鶴見祐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岡洋右。其中鶴見是文學專家、石井是經濟專家、松岡則為雄辯家。

胡適的思想，可以概括如下八點：

1. 要怎么收穫，先那麼栽。（這是實事求是，辯證法）

2. 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這是為學與做人的基本方法）
3.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是結合批判和研究的求真的學習態度）
4. 不作無益事，一日當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嚴謹的人生態度）
5.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慈悲，儉樸，謙和，禮讓）
6. 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世上只有相對的自由）
7.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誠實的唯物觀點）
8.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話與魯迅的名句：[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滅亡]，互相輝映，互為瑜亮）